

魅力工艺与西域各民族的日常精神生活

孙 葛

历史上,新疆属于西域地区,是中原与中亚、南亚、西亚及欧陆的连接带,其居民有一种潜在的商人与手工艺人相结合的气质,具有敏感的艺术意识。

在民居内部,木雕门窗、石膏雕饰的墙面贴花、精工敲嵌的箱子等家具、轻柔的丝织窗帘纱幔、织工精致的地毯等,无论住宅外部如何古旧,内部都有出人意料的华丽。各种日常用品和装饰物、节庆的礼仪中招待客人的瓷、陶质及铜、金、银等器具,都因精美的工艺而具独特的魅力。

学者研究丝绸之路,大多将重点放在西域对于东西方文化传播的作用上,但很少有人深入地探究这种传播对西域各民族日常精神生活产生的影响。工艺美术既是艺术又与社会生产有着直接的联系,具有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的双重属性,一部工艺美术史,就是一部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发展历史。处于丝绸之路中介位置上的西域各民族,为何如此喜爱手工艺织物、器物、饰品等工艺品?我们的研究不应只从了解民俗的角度去考察各民族的器物、服饰等,更应从对器物的研究中解读西域民族的内在精神。

丝绸之路传播了当时彼此遥远的民族最令世界着迷的魅力工艺。西域考古揭示,作为丝绸之路的中介地,这里保有在中国文明与地中海文明以及印度、伊朗和中亚其他国家大范围文化交流时的各种遗存物。这些遗存物告诉我们,当年商队带来各式古老而华丽的手工艺品,使这一地域的人们拥有不一般的眼界,仅从吐鲁番出土的丝织品就可以证明这一点。吐鲁番被贡纳尔·雅林称为世界上最富有的露天考古博物馆之一,这里保留着时代跨度大、纹样种类较全的丝织品,从两晋、南北朝、隋到唐中期各个时代的标本均有发现。在纹样方面,从早期的几何纹、云气纹、变体几何纹、陵阳公样到连珠纹和各种花鸟山水纹,几乎囊括了中国宋以前丝织品的代表性图案,而每一种图案都有几种纹样标本,其中有的还是全世界仅存的实物标本。吐鲁番出土的丝织品中,除大量的汉族风格纹样外,还有少数民族风格的胡王锦及波斯锦或中国仿制的波斯风格织锦等(参见赵华《吐鲁番出土丝织品图案及其源流初探》)。若联系更

早时代的丝织品,如20世纪40年代阿尔泰山区发现的战国时期的凤纹刺绣及塔里木盆地古代遗址不断出土的各种汉代丝绸,还有直至今日仍大量留存的各式清朝服装,就可以想见在数千年中,技艺精湛的丝绸以其富于想象力的图案与绚丽色泽对于当地居民审美力的影响。

新疆地域广阔,古丝绸之路上来自东西方的商贸品、人员、宗教、文化等的交流,使得这里并存着多种文明。

研究华夏文明与外国的关系,二者之间的地理距离和精神距离同样值得重视。探析作为中介地域的各民族接受不同文化的情景,将看到由于这种特殊的地理距离和精神距离,本地居民在与多个民族相遇时产生的更为特殊的景观。作为联系东西方文化必不可缺的纽带与中介,这里的各民族在根据自身的需要和感觉进行文化实践、吸收异质文化输入的不同成分时,产生了文化吸纳与包容的多元性。这里的民族不单单是东西方物质和精神文明交流的载体,而且将不同文明的因素融汇,再染上当地文化的色彩。在本地的工艺品中,形式风格既有强烈的地方性又有浓郁的外来特色。这在直到今天还在使用的手工艺品的材料和手法、手工艺品的装饰、手工艺品的结构造型和设计制作方面都有明显的特征。

探究当地民族内在的精神和历史深层因素,人种学与语言学者的研究告诉我们,这里是历史上不同民族的迁徙流动之地。迁徙流动带来地域居民不同类型的文化背景,也带给这个地区居民对多方文化的选择与认同,这是西域文明展现出多维面貌的深刻原因。

这里也是一个多种宗教曾先后或者曾同时并存过的地域。不同的宗教文化在本地区的流行和传播都影响到当地人的的人生观、宇宙观及审美观的形成和确定。对事物的审美判断在某种程度上受制于宗教观念。当地工匠把智慧运用到宗教活动中,这在根本上对当地的手工艺文化施加了决定性的影响。每一次宗教的传入不仅带来了异地文化,而且也为当地的工匠提供了锤炼技艺的机会和展示艺术技巧的

舞台(参见伊明江、阿不都热依木《维吾尔族手工艺文化研究》)。

高昌回鹘曾以相当恢宏的气度和宽容精神,充分吸收和借鉴各种宗教的精妙教义,在实际活动中,互相尊重。他们广泛吸收来自各方面的文化要素,产生了特有的合成式的文明(参见羽田亨《西域文化史》)。这也使其手工艺艺术显得丰富多彩,生动迷人。从现存的信奉佛教时期的手工艺品中,不仅能看到佛教艺术的工艺特征,而且也能看到当时其他宗教艺术的特征。

伊斯兰教在新疆的传播,不仅与原有的文化形式发生了交融,而且给维吾尔族文化的发展及风格的再塑创造了新契机。它取代了先前那种多宗教并行的局面,并使得手工艺文化从多宗教文化影响状态向单一的伊斯兰教文化氛围转型(参见伊明江、阿不都热依木《维吾尔族手工艺文化研究》)。虽然伊斯兰教从根本上反对偶像崇拜,但对手工艺品并没有限制,伊斯兰教注重抽象性表现和繁缛的装饰,这些都被应用于建筑及各类饰物中。

从文学作品中可以找到这个地域对于手工艺匠人与商人的态度。在《福乐智慧》第四十九篇中,谈论了如何看待商人,认为“他们从事商业是有用的人。人们的需要靠他们供给,人民的美丽要赖他们来打扮。他们从东到西经商,给你运来需要的物品。世界上无数珠宝和珍品,都可以在他们那里找到”。第五十一篇阐述了如何看待工匠:“还有一种人是工匠,他们靠手工艺谋生。他们也是你们所需要的人,你接近他们会从中受益。他们中有铁匠、鞋匠还有木匠,还有油漆工、画师和弓矢匠。工匠种类很多,这里不必一一细数。世界的装饰靠他们,人间的奇迹由他们创造。”(尤素甫·哈斯哈吉甫《福乐智慧》)

魅力工艺作为在东西方交流中形成的独特文化,在本地区具有广泛的需求,与地域的自然气候与精神环境密不可分。

辽阔的地理空间与相对独立的单个绿洲,构成这里居民的生存环境。民居苍凉的外部由于风沙等不利条件不适宜特别装点,但居民拥有敏感的艺术意识,要求对自身服饰和居所内部精心装扮。外部空间的广袤使他们对于繁缛的装饰,绚丽的色彩具有强烈的需求。他们甚至认为,一所没有经过装饰的建筑不配称为居所建筑。

自然气候影响着人们的精神追求。丝绸之路文化传播地地带的各个国家,都有着对于节庆的喜爱之情。一切机会都可以成为节庆宴会的借口,任何节日都要很排场地庆祝一番。在帖木儿王朝的城邦中,节庆活动非常绚丽多彩。人们在那里支起了闪烁着光彩夺目颜色的帐篷与亭阁,任何想前往那里的人,都必须身着盛装。帖木儿的一道布告就指出:好好洗脸,穿上你们最漂亮的衣服,准备玩个快乐吧!帖木儿朝人酷爱豪华,讲究穿戴成为时尚。它也如同所有时尚一样变幻莫测或反复无常。在他们那里,金银丝的织锦、丝绒、丝绸上均覆盖着想象力丰富的装饰图案(鲁保罗《西域的历史与文明》)。伊斯兰文明也经历过同样的现象,《古兰经》声称,不穿丝绸的人就不能进入安拉的天堂。从阿巴斯哈里发王国时代起,富人和强人都以其丝绸长袍倍增来炫耀其富有。虽然,在16世纪时,奥斯曼帝国的国王苏里曼曾身穿棉布衣,禁止穿戴丝绸、金银丝织锦等衣服,但在他晏驾的翌日,全部豪华衣饰又都重新出现了(参见F. B. 于格、E. 于格《海市蜃楼中的帝国丝绸之路上的人、神与神话》)。

很明显,对于魅力工艺的喜爱成了在丝绸之路文化传播中介地带各民族生活中经久不变的爱好的。这些都已深深地渗透在西域居民的日常生活中。

西域的自然气候与精神环境,共同形成西域地区居民对魅力工艺的需求。今天,这里的手工艺师仍生产着为本地居民喜爱的丝、棉、毛织品,更善金、银、铜器。它们顽强的生命力,来自于其精神氛围,以及日常生活的影响。这一切因素相互作用,共同形成了维吾尔族手工艺文化产生的合力(参见伊明江、阿不都热依木《维吾尔族手工艺文化研究》)。

从当地民族内在精神及历史去探析魅力工艺与西域各民族的日常精神生活,可以从中观察到古代西域民族对外来艺术的敞开心态以及在不同文化的接触和传播中,这里的文化原野上开放出的奇丽之花(同上),这些由西方文化之源与传到这里的东方文化因素相融合而产生的魅力工艺,是西域人对保存和发展人类文化作出的特殊贡献。

(作者单位 新疆师范大学艺术学院)

责任编辑 韦平